

译者书

唯有友谊，才是世界的珍宝

薛庆国

念、个性、写作语境等因素。由于这种种因素，阿拉伯诗歌必然不同于中文诗歌。因此，译成中文的阿拉伯诗歌，还应该带有某种陌生感和独特性，这就需要保留原诗的整体风格，如意象的新颖感、句式的冲击力、词语搭配的和諧性或突兀性，这样才能给中文诗歌和读者提供新的给养和刺激。譬如在《祖国》这首诗中，我保留了原文中（父亲）“像云彩一样绿色地死去”这一很有冲击力的表达，给读者留下了丰富的联想空间。不过忠实呈现原诗的总风格，并非意味着对原诗亦步亦趋，有时还须在翻译时做出创造性的变动。总之，我希望译诗既身披得体而优雅的中文外衣，又有着独特的阿拉伯灵魂和气质。

书写四十余载 中国情缘

早在1980年，阿多尼斯首次来华，其间与夏衍等中国作家进行了十分深入的座谈。回到贝鲁特后不久，他撰写了两篇长文，记录中国之行的感想和印象，并在当地主要报刊发表。在其中一篇题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文中，他对当时中国思想界、文学界呈现的蓬勃朝气印象深刻。在文章结尾，他对中国做了这样的预言：“在不远的将来，她或将创造另一个世界。”

2009年3月，为出席《我的孤独是一座花园》中文版首发式，阿多尼斯再度来华。时隔将近30年，中国已是一个全新的国度，用他的话来说：“除了长城，一切都已改变。”此后，他又8次来华出席各种活动。虽然阿多尼斯足迹遍布世界，但他对中国情有独钟。这其中有多原因，譬如：他由

衷地钦佩中国的自然和人文之美，他和许多中国朋友结下了深厚情谊，他能明显感受到中国读者对他的崇敬和喜爱……更重要的原因，或许在于他被亲眼见证的中国巨变所震撼，因此，他对这个焕发出非凡活力的东方古国充满好感。在阿多尼斯的心目中，中国是未来的象征，为他开辟了新的知识与诗歌空间。中国，“不是线条的纵横，而是光的迸发”。

2018年金秋，阿多尼斯应邀来华参加鲁迅文学院举办的国际作家写作计划，其间，他前往南方多地参加活动。回到巴黎后，阿多尼斯根据此次中国之行尤其是黄山之行的印象、感受和思，创作了中国主题诗集《桂花》，并于次年出版。在这本诗集中，诗人把叙述、想象与沉思熔于一炉，呈现在诗中的风光景物，既是感官的见闻，更是想象和意念的结晶。和阿多尼斯多次中国之行一样，我有幸全程陪同他前往各地。因此，我不仅是这部诗集的译者，还是诗歌文本产生的见证者，曾目睹他如何“和松树握手，从桂花的唇间饮水”，如何“把呼吸作为纱巾，搭在黄山的肩头”。

令我深为感动、惊讶的是，在中文版《桂花》出版时，阿多尼斯坚持要在卷首用中文写上“献给薛庆国”，这对我而言是一份受之有愧的荣誉和礼物。我深知，浪漫的老诗人以这种独特的方式，既对我这位中国译者表达鼓励和厚爱，更对中国人民表达爱恋和敬意。正如他在《桂花》的尾声中写道：“友谊是否可以声称，唯有自己才是世界的珍宝？”我在谨慎诚恐的同时，也能为给中外文学交流史留下一段佳话而自豪。

今年，阿多尼斯已92岁高龄，但老人依然精神矍铄，笔耕不辍。去年底，他刚刚出版了诗歌体自传《阿多尼亚特》的法文版，书名有意模仿荷马史诗《伊利亚特》。眼下，他正在专注写作多卷本的诗歌体自传。有中国朋友在筹划疫情后的诗歌活动，托我问阿多尼斯有无可能再来中国。当他在电话中转达朋友的邀请时，他毫不犹豫地回答：“接受邀请，没问题。”仿佛他已忘了自己的年龄，或者年龄已经把他的淡忘；又或者，正如他在诗中写道的：“你想知道诗人的年龄？创新的诗人没有年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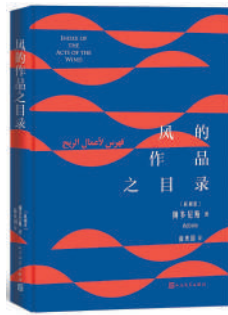
薛庆国，1964年生，北京外国语学院阿拉伯学院教授，译有《我的孤独是一座花园》《桂花》《风的作品之目录》等作品。2017年获卡塔尔“谢赫哈马德翻译与国际谅解奖”，2022年获第五届袁可嘉诗歌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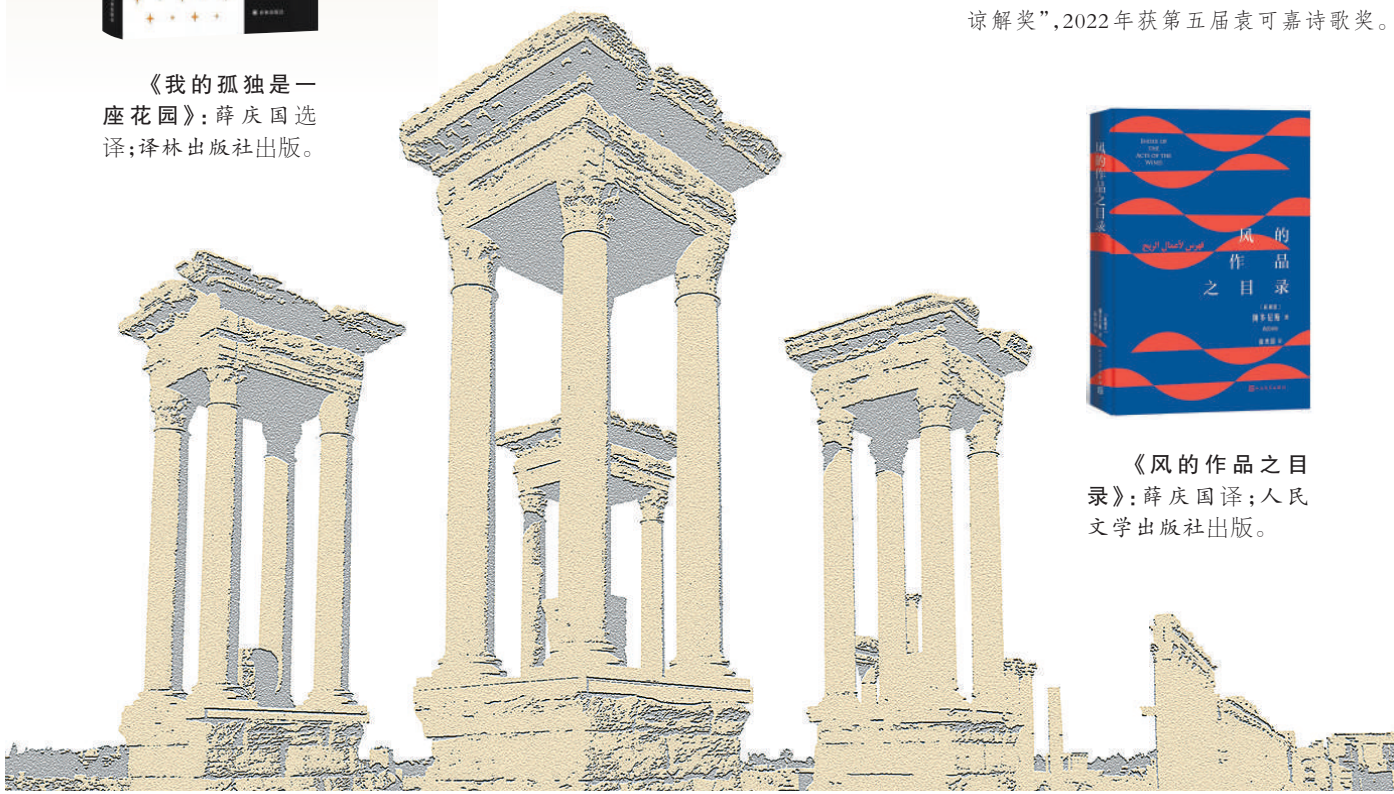
《我的孤独是一座花园》：薛庆国选译；译林出版社出版。



《桂花》：薛庆国译；译林出版社出版。



《风的作品之目录》：薛庆国译；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到印尼桑吉兰 感受沧海桑田

乔鲁京

尤金·杜布瓦、孔尼华为代表的学者把目光投向爪哇岛中部梭罗河沿岸的桑吉兰地区。

对桑吉兰的考古从1890年开始，1937年有关“爪哇人”的研究成果首次面向公众发布。100多年以来，在56平方公里范围内，古人类学家系统调查了约240万年来的地层，发现了分属于100多个直立人的大量化石。这些化石不仅展现了更新世人类认知的进化历程，更证实桑吉兰地区160多万年来一直有古人类生活。这里毗邻赤道，属热带雨林气候，终年高温潮湿，日复一日风雨冲刷，遗址保存状况如何？56平方公里内星罗棋布的发掘点，现在又是怎样展陈的？距离目的地越近，我的好奇心越发强烈起来。

司机先带我到游客中心所在地克里基兰。正值假期，游客之多超出想象。和工作人员交流得知，游客大多来自附近的梭罗市，赶上一天假日，或全家出游，或学校组织游学。与中国一些成熟的大型遗址公园相仿，印尼政府选择了四个重要的遗址点，分别以人类进化、当下研究、遗址发现史等为主题建设分馆，并在它们和游客

中心之间建设专门的交通线路。

我去的第一个分馆在布库兰，相比低矮、略显陈旧的克里基兰游客中心，这里的展馆建筑高大簇新，布展以进化论为线索，全面介绍了人类的进化历程。特别是展厅内安放了许多符合青少年兴趣特点的互动装置，显示出较高的设计水平。我在展厅内看到许多学生，他们三五成群，津津有味地参观、互动。望着一张张天真无邪的面庞，我的内心深受触动。

和孩子挥手作别，我来到和布库兰毗邻的曼雅瑞克，这里有一座小型博物馆，最大特色是考古发掘探方的原状陈列。建筑师从中爪哇地区传统建筑中提取符号，设计出宛如风雨桥一般的保护棚，加设在考古发掘探方之上，令这些珍贵的探方清晰地呈现在高温高湿环境中原地保存，打消了我对热带雨林地区土质遗址能否妥善保护的疑问。

车子在赤道的乡间丘陵辗转，来到了达玉，这里的博物馆聚焦当下的前沿研究。从地形看，此地是下切的沟谷，地质学家、考古学家多年来一直在此打探沟、挖探方，精耕细作出的地质剖面具有极高的科

学价值。虽然至今我都不知道达玉博物馆的设计师是谁，仍深感其设计颇具匠心与巧思。他不仅依着向下的地貌顺势而为，展示多个地质剖面，更在沟谷底部的小块平地“螺壳里做道场”，设计出供附近村民使用的休息室和简易的儿童游乐园。热带正午，碧空万里最是酷热，几家村民乘凉休息，孩子们在乐此不疲玩耍。

放弃午饭，继续在狭窄的乡间公路前行。路面变得破旧，颠簸中，眼前突然出现一座崭新的宏大建筑，恩格那博物馆到了。这里重点展示的是桑吉兰遗址的发掘史，其中专门提到当地华人采集中药“龙骨”，从而推动杜布瓦等科学家发现“爪哇人”化石的故事。从布库兰开始，每座博物馆都不收费，但需登记，外国人还有专门的花名册。我好奇地浏览恩格那的记录，发现这里几乎没有外国人来过。上一名外国参观者是韩国人，已是小半年前的事了。由此再端详恩格那的镇馆之宝——一具保存几乎完整的三角头剑齿象化石，顿觉这头巨兽硕大的骨架兀自伫立，很是落寞。

结束一日游，司机说他虽是当地人，也没来过这些分馆，今天玩得很开心。返回日惹的路上，他友善地停车，带我登上印尼考古协会建造的瞭望楼，俯瞰桑吉兰全貌。那是热带的、望不到头的一片绿海，满溢着生命力。2019年底，学术期刊《自然》刊登“爪哇人”最新科研成果，这些直立人一直生活到距今10万年前，他们的少量基因仍保留在我们——现代智人的体内。从茹毛饮血到发出“人生三问”，百万年沧海桑田，似乎倏忽而过。

“拉美”、“文学”和“爆炸”这三个词搭在一起，实在是富有张力的组合。按照智利作家何塞·多诺索的说法，那些最早给新兴的拉丁美洲小说安上这个名号的人，可能认为它意味着短暂和空泛，“轰隆”一声过后，留下不什么东西。然而事实证明，这场“文学爆炸”更应定义为接近英文本义的“文学繁荣”，因为留下了一批重新定义西班牙语文学的划时代之作，而且经由翻译和传播，它们还影响了世界其他地方的文学创作，成为世界文学的经典。它们让全世界的出版商对当时的拉美文学刮目相看，其中的优秀作品持续不断地被关注、被引介。用今天的眼光来看，拉美“文学爆炸”已经成为世界文学史中的必要章节。

文学形式的革新者

关于拉美“文学爆炸”是何时开始，又是何时结束，学界比较一致的说法是始于1960年代初，终于1970年代初。在此期间，涌现出一批高质量的拉丁美洲小说，尤以1967年出版的《百年孤独》标志着这一波文学浪潮的顶点。人们普遍将1962年视为开启之年。多诺索在《“文学爆炸”亲历记》中详细回顾了这一年智利康塞普西翁大学召开的会议。当时拉丁美洲风头正劲的一批作家参加了会议，打破拉美各国间长久的文化隔阂，创作一种不但属于本国、更属于整个拉丁美洲的文学，成为与会者们的共识。

也是在这一年，一批后来被奉为经典的拉美新小说几乎同时面世，包括巴尔加斯·略萨的《城市与狗》和卡洛斯·富恩特斯的《阿尔特米奥·克罗斯之死》，再加上胡里奥·科塔萨尔在1963年出版的《跳房子》，这三位作家与加西亚·马尔克斯并称为“文学爆炸”的四位主将。当然，拉美新小说不是在1960年代才凭空出世，而是经历了多年酝酿。有学者指出，这场文学运动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就开始探索尝试，50年代加速推进，直至60年代全面爆发。

每一次文学革新，都是一次颠覆性的创举——年轻作家们断然拒绝上一辈人的美学理念，试图另辟蹊径。拉美新小说萌芽之前，在拉美小说中占据主导地位的是那种用风俗主义的眼光、现实主义的手法书写本地乡土题材的作品，这些作品反映出当时陈旧闭塞、缺乏美学创新精神的创作环境。拉丁美洲新一代的小说家们从欧洲和美国的现代主义小说中学习创作方法，他们看重的不是这些故事“讲什么”，而是“如何讲”：原来小说还可以这么写！然而，他们并不是单纯地模仿欧美作家的写法，而是对之有选择地吸收，摸索出一套创造性方法，用来讲自己土地上的故事。这些故事不再是本地风俗的记录，而是对民族根源的追溯、对人的命运和拉丁美洲命运的探索、对社会现实富有哲理的映射和反思。

最开始做出这样尝试的作家，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并没有在本国文学批评界和读者群中引发广泛关注。正是《百年孤独》等作品的巨大成功，带动了拉美小说的整体崛起，使得马尔克斯之前的那些作品真正受到关注，让墨西哥作家胡安·鲁尔福、乌拉圭作家胡安·卡洛斯·奥内蒂、阿根廷作家博尔赫斯等更为年长的拉美作家被“发现”。就这样，从1899年出生的博尔赫斯到1936年出生的略萨，各个年龄层的拉美作家都被囊括其中，成为文学形式的革新者。

拉丁美洲的故事

王国维先生说，凡一代有一代之文学；罗曼·雅各布森断言，每个时代的艺术中均有一种艺术作为主导。如果说在20世纪上半叶，拉美文学主导性的体裁是诗歌，那么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小说，尤其是长篇小说就成为拉美文学最有力的代表。诗歌能抒怀咏志、唱出个人的声音，而小说则能讲述民族的寓言。在拉丁美洲人民争取解放的斗争中，一种新的拉丁美洲共同体意识逐渐成形，这种意识影响到文学，同时也被文学所塑造。

拉美新小说讲述的不仅是一地特有的故事，更是整个拉丁美洲的故事。这些故事往往从寻找根源的主题开始。在鲁尔福的

六十年后，拉美『文学繁荣』再回首

张伟劼

《佩德罗·巴拉莫》中，一个男人带着亡母的嘱托，踏上了寻找生父的漫漫旅程。在《百年孤独》的第一章，布恩迪亚带着他的族人要打通一条连接马孔多和外部世界的道路，他们沿着与西班牙征服者相反的路线行进，在雨林中发现一艘西班牙大帆船……在这些故事里，原本生活在与世隔绝状态中的拉丁美洲人一次次见证从欧美舶来的现代文明奇迹。例如在《百年孤独》中作为拉丁美洲象征的小镇马孔多，第一次见到火车的居民只能以“一个吓人的东西，好像一间厨房拖着一个镇子”来形容这一现代发明，它既是进步的许诺，又似不祥之兆。对于他们来说，火车如同神话般魔幻。从这个意义上说，“魔幻”意味着欠发达，意味着尚未祛魅的状态。马尔克斯和他的同行们讲述的，就是当时生活在欠发达状态中的拉丁美洲人经历的欢欣与苦难，他们一次次被点燃又一次次被浇灭的希望。

当然，“魔幻现实主义”不等于当时拉美小说的全部。这些拉美故事不断突破小说自身的界限，或与其它艺术形式有所联系，或邀请读者一起向传统的小说阅读方式发起挑战，它们意味着新的结构、新的语言。富恩特斯的《最明净的地区》读起来就像在观看墨西哥现代艺术家创作的巨幅壁画；阿莱霍·卡彭铁尔的《追击》采用了与交响乐的诸乐章相呼应的故事结构；略萨的《绿房子》如电影镜头般轮流展现在不同空间中并行、最后交织在一起的多条故事线；科塔萨尔的《跳房子》更为大胆，让读者自己去选择章节的阅读顺序；卡夫雷拉·因凡特的《三只忧伤的老虎》从小说标题开始就不断抛出文字游戏。在这些作品中，我们能感受到作家无穷的创造力和拉丁美洲人民不竭的生命力。这些力量的积累，要突破小说固有的边界，要释放太多的能量。

从20世纪70年代起，拉美文学难以复制那种划时代作品集中诞生的热闹场面了，但其余波仍久久未平。在文学后辈们如伊莎贝尔·阿连德的《幽灵之家》中，能明显看到《百年孤独》的影子，罗贝托·波拉尼奥的《荒野侦探》也带有《跳房子》的痕迹。曾经几乎不为世人所知的拉美小说，已经成为各国出版商绝不会忽略的选题。60年后回首，这就是拉美文学的“走出去”，是拉美作家以饱含原创性的精神、跨越国界和大洲的眼光和气度，尝试了小说创作的新的可能性，实现了拉美小说的现代化与国际化。这也是拉美“文学爆炸”在热闹过后留下的一份宝贵的经验遗产。

（作者为南京大学西班牙语系主任）



旅人心语

我在印尼爪哇岛的古城日惹逗留时，得一日空闲。是去攀登默拉皮活火山，还是寻访桑吉兰“爪哇人”遗址？斟酌再三，后者占了上风。为何这样选择？因为想到“人生三问”：我是谁？我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桑吉兰遗址之于印尼，犹如周口店遗址之于中国，同为古人类化石圣地。或许，这些疑问可以在桑吉兰得到解答吧。出发那天正值农历正月初一。清晨，出城路上车流量明显多起来。和司机闲聊，才得知从2002年开始，农历新年已成为印尼的法定节日，放假一天。行行停停间，翻阅搜集的各种信息：1882年达尔文去世时，他提出的生物进化论已被公认为19世纪自然科学的三大发现之一。受进化论感召，140年来，一代代古人类学家前赴后继奔赴世界各地发掘化石，不断丰富完善我们对人类起源的认知。这其中，以